

● 教育前沿·关注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

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治理体系

张珏

编者按：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指出，推动区域教育创新发展，做好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发布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数，为践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要求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区域特点的教育治理新体系奠定重要基础。本版自今日起开设“教育前沿·关注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栏目，持续关注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制、功能、监测路径等，探索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规律，探讨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治理体系之道，以期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期关键词：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视觉中国 供图

评价结果与教育政策的紧密关联、教育发展监测评价结果运用于社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新进展，为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方法研究提供了全球视野、比较参照和方法启示。

从国内实践看，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以及发达地区，尤其是在长三角区域内的省份，其实践探索直接为研制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 2010 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之后，相关部门研究开发出一套包含 40 个数量指标的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及其监测评估成果，形成了“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等重要判断，为确定我国在世界教育发展坐标系中的方位作出重要贡献。

上海、江苏、浙江、四川成都等区域有着丰富的探索经验。例如，上海面向 2035 教育现代化发展展开新一轮监测研究，已连续两年开展面向 2020 年目标的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实践，浙江省在开展县（市、区）教育现代化评估的基础上，启动实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监测，并通过财政拨款和购买服务方式委托杭州师范大学承担监测评价工作，为适应江苏省从县域基本教育现代化向省域总体教育现代化跨越的新形势，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开展了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在长三角区域外，如成都市以率先在中西部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每年对各市区（市）县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监测，发布《成都市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年度报告》，提供政府决策咨询。

紧扣高质量发展:加强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顶层设计

围绕推进区域和各地如期实现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制，必须做到：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研发工作。指标体系的研制及其监测评估实施都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指导，从国家战略和教育现代化发展大局出发，组织实施好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各项工作，展现长三角区域走在时代前列、勇立潮头的担当。

二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导向。在发挥指标体系的引导作用过程中，注重引导各级各类教育深化改革，促进基层和一线探索创新，切实增强学生的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坚持率先发展，以“到 2025 年，长三角地区整体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为指引，按照长三角领先全国 10 年左右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规划要求，敢想敢干、作出表率。

三是努力确保指标体系研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指标体系研发要有可靠的理论和实践支撑，要确保后续的实际监测评价研究工作科学、有效和高认可度，能够综合运用多方面权威数据信息，采用先进的监测评估方法，获得可靠的监测评估结果。同时，还要通过优先选用一批认可度高的国内国际统计指标，为开展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提供基础支持。

指标体系研制要关注其系统性，既要考虑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整体发展需要，又要突出上海市三省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既要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又要突出师资队伍建设发展、教育资源条件投入保障、法律法规完善和教育生态环境建设成效。同时，还要反映教育的多种形式产出、贡献、影响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指标体系研制更要关注其实用性，要选择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实践探索中政府、社会、学校和人民群众等各方高度关注的指标及数据信息，特

别是要回应各方关切，选取一些与破解区域及各地教育发展重大、热点、难点问题高度相关的直观易懂、边界明确、可测量指标。

面向 2025: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基于以上考虑，长三角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在内容构成和应用导向上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一是指标体系主要由七大板块构成，采用“6+1”的布局。前六个方面主要用于长三角区域整体监测评估，包括 6 个集中反映新时代长三角区域教育现代化内涵与重点的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和 71 个监测点，主要用于长三角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监测及诊断、比较和评价。这套指标体系涵盖了 50 个量化指标和 21 个抽样监测点。而第七个方面的指标，则主要用于各省份监测评估，围绕体现各地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用来反映工作重点，破解工作难点，突出工作亮点和标示努力方向。

二是指标体系的来源构成更加多样。具体而言，第一，体现国家教育现代化政策法规的明确要求。即部分指标选自国家相关的教育法律、战略规划以及党和国家、教育部等方面政策文件中的相关要求。第二，反映一市三省推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即部分指标选自长三角一市三省确定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标或受教育年限、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等指标。第三，借鉴国际机构常用的教育先进性可比指标。即部分指标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经常使用的教育统计指标，如各级教育师生比、中小学班级人数、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基础教育教师的工资收入等类似的指标。第四，展现长三角教育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标杆示范作用。即立足长三角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发挥好国家教育现代化排头兵和先

行者的重要角色与使命，围绕体现先进性、导向性、前瞻性和试验性，设计研发若干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指标。

三是指标体系主要发挥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主要用于对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目标达成程度进行监测评估，综合分析长三角教育现代化进程、成效与影响因素，为科学判断和把握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支撑。第二，对长三角一体化教育联动发展状况进行监测评估，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教育联动发展建言献策。第三，对一市三省教育现代化特色发展进行监测评估，分析判断各地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与进展、目标实现程度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挖掘特色与典型案例，总结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与经验，诊断不足与短板等问题，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第四，对国内国际相对发展水平进行监测评估，即对照不同类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横向对比中判断长三角教育现代化在国内、国际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分析长三角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与瓶颈，为推动国家区域教育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贡献长三角智慧：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针对新时代我国区域和整体教育发展的新需求、新变化、新特点，从系统化、多样化、动态化、法治化等多个维度，讨论构建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区域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监测方法。这是基于为加快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提供制度性支持与保障的重大需要。从实际运用角度看，指标体系中六个方面主要内容的监测方法及监测结果，可以直接影响到区域和各地教育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的诊断和评价结果，对于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均具有强烈的引导、督促和鞭策作用，甚至可运用于公共问责和行政问责，其监测结果也容易引起各地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利于形成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推动教育发展的合力。

因此，长三角区域要提高站位，要把监测评估制度建设作为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技术手段和监测评价制度，为推进大教育治理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长三角区域要创造出更多可供全国复制与借鉴的做法和经验，在引领我国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中发挥标杆带头作用，为我国履行关于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 2030 行动框架》的承诺提供有力的支撑，彰显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问题探析

共生性教育治理的智慧

刘业峰

教育领导与管理是教育领域关切教育组织运作和变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学者库班（Cuban）认为，领导是在实现欲想目的的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行动，管理是有效地维持组织当前的安排。

具体到教育领域来说，教育领导侧重于实现教育变革，教育管理侧重于维持各类教育组织秩序。实现教育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坚持开拓创新，坚持理论创新，用新的理念来指导教育领导与管理活动。当前，人们的信念不断经受考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新的对话理论应运而生，即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动，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和行为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该理论已经由最初着力于批判或解构发展到后来的进一步建构，由对理论、方法的研究发展到具体的实践。其对于人际纠纷的解决、学校教育与各类组织的管理、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等，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社会建构论强调对话、生成与合作，注重关系，这对教育领导与管理的内在耦合性极具指导意义。

一是以建构型思维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理念，从工具性管理走向共生性治理。

在管理领域，工具性管理主要是指主管部门与所管理对象之间存在的权威性主客关系。主管部门对其管理对象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其身份和角色不但使其有责任对管理对象进行指导，也有经验和能力对管理对象进行引导和管理。这种工具性的管理理念必然带来单向度、不容挑战的管理关系。如只关注任务完成、一味追求实用等。

社会建构论倡导形成共生性的教育治理理念。其代表性观点是，“我们建构了世界”“通过共同讨论，我们也许能够建构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建构论的最大魅力在于它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其重要代表学者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Gergen）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革新，就必须改变建构世界的传统方式，从关系的视角去理解世界，通过谈判、协议等各种协调方式去创造未来。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思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组织可以采用“上下联动”的方式，与学校、社会组织等一道通力合作，共建共治。学校在校内管理活动中，鼓励学生及家长真正参与进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治理好学校。

二是以关系性存在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目标，从促进个体发展走向增进关系潜能。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教育领导与管理自然是服务于教育需求，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支撑，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个体也处于不同的关系。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性存在”。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个体所获取的知识也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基于个人经历和体验建构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在教育领导与管理目标中增进参与关系过程的潜能。关系性存在是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肯尼斯·J·格根认为，“不是独立的个体相聚而形成某种关系，而是关系赋予独立个体存在的可能性”。个体的心理、身体、言谈举止等都是关系的产物，个体不仅不是关系性自我，而且是多重存在。另外，社会建构论认为，知识和理性也是关系的产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如果关系是首要的，就必须针对学生所处其中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结果来提问题。社会建构论认为，教育要增进参与过程的潜能。从教育领导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关注教育系统内部的关系运行，还需要注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关心全世界教育系统的发展进程。

三是以欣赏型探究重构教育管理模式，从单一对话走向寻求对话合作。

以欣赏型探究理论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模式，意在尝试建立寻求对话与合作的新范式。站在关系的立场上，教育领导与管理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义建构场所。针对教育领导与管理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发动以有效行动为目的的合作过程。这意味着必须促进关系丛之间的协作，以这种新的方式生成新的意义和价值，激发新的动机。一是主管部门要协调好系统内的各方关系，统筹配置资源，畅通各类学校参与重大教育决策渠道，倾听不同学校的意见，努力促成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二是学校内部治理要协调好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家长等各方关系，善于培养和发生学生的领导才能与管理能力，每一名学生都有可能具有独特的技能、意见、价值和信念，努力生成有活力的校园文化。

正如肯尼斯·J·格根所指出，任何组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有效协商的能力。若组织成员发生冲突，团队的有效性将不存在；若组织成员不理解或不欣赏领导者的观点，领导者的作用也就无从发挥。关系型领导力是指在关系中积极参与并有效建构未有的能力，关系型教育领导者具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乐于分享和宣传先进教育理念和政策。在广泛分享和宣传后，教育理念和政策更容易付诸实施。二是善于教育管理改革注入价值。对教育改革的细化、专业的解读，将有利于改革推行。三是精于为教育事业发展建构现实。对现实的建构程度，反映了教育改革的推进程度和教育对师生行为的影响程度。“叙事”和“隐喻”的谈话方式是建构现实的有力武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南京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视角下的教育领导与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研究”[2021SJA0407]成果

● 热点透视

高校应急教育帮助大学生应对未知世界

徐焕文

应急教育是一种安全教育、生命教育，更是一种国民素质教育。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责使命，同时也是国家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既是高校完成其使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高校作为社会单元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后疫情时代”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广泛而深远的挑战，国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应急知识教育，高校作为重点防控区域，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必要也有责任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持续、高效的应急教育。同时，更要从应急学科引领、应急教育协同、应急思想教育、应急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推进高校应急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实现现有应急教育体系的重塑与升级。

引领应急学科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应急教育散见于国际组织的文件、报告和基金援助项目。我国现代应急管理 and 应急管理教育起源于抗击非典时期。最近十多年，我国高校在应急教育与管理方面也跟进设置了相关专业，很多学校还增设了本科专业。但仍然存在应急教育体系不完善，应急教育专业开设不足，应急教育理论创新

不强、内容偏窄，缺乏应急教育实践基地和实训基地等问题，严重影响高校应急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应急学科的发展。应急学科建设需要以专业院系作为支撑平台，进一步与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融合，促进跨学科、跨学校、跨区域的学术交流，解决师资培养问题，提升应急教育讲授的效果，丰富应急教育科研的成果。同时，应建立由高校、政府、专业应急部门组成的高校应急教育协会，形成师资交流与培训机制，打造教学与研究的高质量平台。应急学科发展以系统、成熟的应急教育课程为标志。这也是更好地实现应急教育“进高校、入人心”的必然前提。有必要从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课程评价等各个方面综合考量应急教育课程建设，优化课程教育结构。一方面，注重应急教育通识课程的开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依据，以教材作为最终成果衡量标准，编写适应“后疫情时代”高校应急教育需求的优质教材。另一方面，还应注重疫情防控、危机心理调适等专项应急教育课程的研制，为高校学生群体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

实现应急教育协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协同。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政府、高校、企业、医院等的密切合作，彰显了协同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应急教育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需构建完善的多元主体协同教育实践机制。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借鉴国外他山之石的基础上，应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积极推进应急教育体系和教育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是应急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者，应进一步推进高校应急教育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团体、高校、企业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资源整合调动机制，积极支援高校应急教育体系建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切实制定保障政策并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价考核。高校既要发挥校内校外教师的专业优势，又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政策、资金、人员和场所保障应急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贯彻落实防灾减灾日常教育教学计划。在校内建立一个协调联动、高效推进的应急教育工作机制。应急教育应打造一个共享互通、高效便捷、弹性智慧的应急教

育新生态。

强化应急思想教育。高校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健全人格的成长期，持续学习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应急素质和能力提升的关键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全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和执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保障。高校应急教育必须囊括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敬畏自然。保持身心健康是高校学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基本前提。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复杂严峻。高校应急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忧患意识教育，让大学生充分发挥其作为公民应有的道德素质与政治责任感，更加健全地理解政府治理的要旨和方式。提升高校学生的政治辨识能力和忧患意识，促进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维护国家利益。紧密跟踪落实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断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强化亲情教育、感恩教育，提高其抗拒与抗压能力。

营造应急文化氛围。高校应急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形成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的文化建设。“以人为本”在高校教育系统中主要体现在对青年学生的关注、关心与关爱；解决

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展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活动，维护大学生的根本利益。在高校应急教育系统中，针对青年学生特点，则应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塑造学生的应急情怀。一方面，引领学生观看应急管理中充满“爱”“希望”的影视作品和加强正能量案例教育，让高校学生接受心灵洗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园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栏、横幅、海报等载体传播应急文化，持续、渐进建构预防、安全、的重叠共识，营造浓郁的应急文化氛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传播，已对世界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冲击。高校要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教育管理的有益做法，把应急教育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中极其重要的教育内容和作品，把握应急教育规律，开展高校应急教育实践，提升大学生应急意识，培养应急技巧，推动高校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和安全环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搭建完整的应急学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需要实现应急教育的协同发展，从而全面推动高校应急教育工作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系吉林工程职业学院